

中国最大的财富家族。毛泽东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荣氏家族的创始人。从 1900 年起，他们靠四部石磨起家，创办了茂新、福新系统的 20 家面粉厂，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支撑起民族工商业的明朗天地。作为荣氏家族的第二代荣毅仁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即投身于工业，继承父业再创业，成为中国拥有 20 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代表。1993 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的第三代荣智健，改革开放后，继承家族精神，独闯香港创业，成为大富豪。如今荣氏家族已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财富家族之一。

兄弟携手 两业称王

荣氏家族的创始人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他们小时候家境不很富有。祖父荣锡畴曾在梁溪河上靠摆渡谋生，后来经商于上海、无锡之间，家道走向富庶，但很快中落，及至父辈荣熙泰一代，越发陷于困顿。

1883年，父亲荣熙泰赴广东，在一名候补知府门下做厘卡师爷。1887年荣宗敬14岁时，父亲停止了他的私塾学习，令其去上海人工厂当学徒。一年后转入一家钱庄学钱业。

也是14岁时，荣德生求哥哥荣宗敬在上海给他找个职业，便也进入一家钱庄当学徒。

三年学徒期满后，荣宗敬留上海森泰蓉钱庄做职员，荣德生远下广东在厘金局帮父亲整理账务。

1894年，森泰蓉钱庄倒闭，荣宗敬回家赋闲。1895年荣熙泰病重，自广东携德生返乡。一时间荣家走人背运。然而，多年与钱打交道的父子三人，绝不会放弃对金钱的追求。父子再三商议出路。

“父亲，我们能不能开一家钱庄？”荣宗敬建议。病中的荣熙泰精神一振，夸赞道：“对呀，宗敬的主意好！”1896年3月21日，在上海南市，一家“广生钱庄”诞生了。这是荣氏父子与人合伙开办的，额定资本3000元，荣氏出资一半，1500元。钱庄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正账。

4个月后，荣熙泰病逝。1899年，荣德生应邀再赴广东，在一家税务局任总账。

后来荣氏企业集团的成长，也许就孕育于荣德生的这次广东之行中。

在广东，荣德生十分认真地读了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虽然传记写得很简单，但他却从中悟出，只有兴办实业，才是给国家增加财富，也是个人发财致富的路径。

但是，实业搞什么呢？1899年7月回乡探亲途经香港时，荣德生看到了一幅图景：中国的苦力正从一艘外轮的货仓里向码头上一袋一袋地背面粉。洋粉？对，就生产洋粉！

到达上海，荣德生以征寻的口气向兄长兴奋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说：“我在粤办理税务，知晓面粉为洋人食品，与朝廷已有条约，不管进口还是通行国内各厘卡，都是免税的。目前国内生产的只有4家，远不够供应，所以大量进口。我们要生产，定能赚大钱。”

1902年3月，一座名为“保兴面粉厂”的企业，在无锡市西门外的梁溪河畔兀立起来。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厂子规模不大，只有工人30多人，法国造炼石石磨4套，每日磨麦1.4万斤，生产面粉300包。

一个小小无锡县城的销路是有限的，所以荣宗敬在省城苏州和大都市上海分设了批发处，并高薪聘人打开了山东、东北市场。

1904年，荣氏兄弟添置了钢磨，日产量增加到800包，并将厂名改为“茂新”。1905年一年盈利按白银计达6.6万两。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1900年后清政府鼓励兴办实业，新建面粉厂很多，同时洋面又大量涌入，面粉业竞争十分激烈。1906年至1908年，荣氏兄弟的茂新面粉厂连续3年出现巨额亏损。

如何在这种大竞争局面中立于不败？读过美国富豪传的荣德生对兄长说：“我看竞争，非规模不能争胜，非名牌不能立足。茂新欲求发展，一要添机扩大生产，二要创出优质名牌。”

精明的哥哥完全同意弟弟的建议，兄弟贷款添置了世界最先进的钢磨，至1910年春，日产能达到2500包，跻身于国内面粉大厂之列。同时，挑选优质麦源，严格技术与质量，创出了享誉国内外的“兵船”牌优质面粉。企业很快扭亏为盈。

这次成功，是荣氏实业的一次巨大转折。此后 10 年间，荣家兄弟把面粉厂扩展到十几个：

1912 年，荣宗敬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一厂，到 1921 年，福新系统的面粉厂发展到 9 个。

荣德生呢，继续坐镇无锡，同时北上济南，将茂新系统的面粉厂扩展到 4 个。

福、茂都使用“兵船”牌商标，面粉产不敷销，向无库存，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远销新加坡、澳洲和英国等国。

福、茂两系统日产面粉 7.6 万包，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工业生产能力的 1/3，国内全部面粉业产量的 1/4，故而，荣氏兄弟被世人和同行誉为“面粉大王”。

荣氏兄弟在经营面粉的同时，介入了纺织业。从 1915 年在上海创办申新一厂到 1931 年发展到申新九厂，拥有布机 5982 台，纱锭及线锭 669426 梭，分别占国内华商纺织工业的 1/3 和 2/7，因而荣氏兄弟才有了“棉纱大王”的称号。

由于在面粉、纺织两个行业称王，所以荣宗敬自豪地说：“从衣、食上讲 我有半个中国！”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进犯上海，荣氏企业除租界内的申新二厂、九厂、福新二厂、七厂、八厂外，其他的不是毁于战火，就是被日军强占征为军用。棉纱、布匹、小麦、面粉被洗劫一空。11 月 25 日，日军攻占无锡，无锡的申新三厂被日军付之一炬，茂新一厂被抢走四万袋面粉后，亦被放火焚烧，熊熊大火一直烧了 5 天 5 夜。几个月的时间，荣氏在沪、锡和济南的 14 个工厂横遭日寇的毁坏和洗劫。

个性刚强、视企业如生命的荣宗敬五内俱焚。他痛恨、悲愤、绝望，一病不起。1938 年 1 月 4 日避居香港，36 天后，1938 年 2 月 10 日，含恨而逝。荣德生是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的父亲。他和哥哥荣宗敬的性格有所不同，荣宗敬外秀慧中，而荣德生内秀仁厚。兄弟俩相辅相成，在荣宗敬去世后，荣氏家族的重担全落在了他的肩上。

荣德生有一个难圆的梦。这就是在抗战期间蛰居上海时他就拟定了

的哪个庞大的“天元计划”，也可以说这是他的又一个美丽的“天元之梦”。

“究竟怎样开创新时代呢？”荣德生认真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回想先兄在日，余无一不推兄为先，由兄总揽全局，业得今日之扩大。”他对宗敬胞兄的魄力和果敢精神是深为钦佩的，对荣宗敬的巨大贡献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他同时认为宗敬为事冒险有余，稳重不足。有两点尤不足为法：一是大举借债扩充，企业势必受银行、钱庄控制；二是从事投机，一旦失败势必累及事业。从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和风风雨雨中，荣德生领悟到在社会生活中，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和商业运销，三者不可缺一；从事实业，要不投机、不奢侈，从基础做起，步步为营；要注意培养人才和企业用人，成功了不张扬，失败了不气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事业永久昌盛……，，

经过两年的准备，1945年11月12日在重庆民族路蓝家巷特5号举行了“天元实业公司”股东成立会，由荣尔仁主持，当时共有股东十二人，集资五千万元。同年底，“天元实业公司”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颁发的新字第1983号营业执照，完成了备案手续。1946年4月在上海汇丰大楼正式挂牌，对外营业。

荣德生看到自己的计划开始起步，心中十分高兴。他对股东们——其中有几个他的儿子——说：

“《易经》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意思是天下万物皆赖以萌生。吾以‘天元’二字命名，无非是表示为国家、为民众谋福利的一番心意。公司既名为‘天元’，亦当求名副其实，以国计民生为重，万物皆备于我，普养天下众生。”

按照荣德生原来的设想，“天元实业公司”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重工业，包括采矿、冶炼、铁工铸造、水泥等；二是“天元家庭工艺社”，主要经营工业，包括麻纺织、棉纺织、毛麻丝交织、丝织、面粉和苞米粉及其制品。其计划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恰如他梦中那个大大的聚宝盆和满天祥云似的莲花一样美丽而又充实。

天元公司的资金主要依靠申新各厂的红利，当时号称拥有资本五千

万元法币（实收不足此数）。荣德生为总经理，荣研仁为副经理，总辖各事。总公司分生产、业务、财务三部。天元公司以后又在香港、曼谷、纽约等地设立了分公司。

荣德生是一位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实业家，晚年更趋稳重。他知道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和抱负，必须锲而不舍，义无反顾，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方能达到理想的目的地。天元公司正式成立于抗战结束后不久，因此他把复兴和重建企业当作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无锡茂新一厂，是茂、福、申新发动的始基。荣德生不顾年迈，抗战胜利后不久即首先着手重建茂一。当他从上海回到阔别六年之久的故乡无锡，看到屹立在梁溪河边的茂一厂房时，一种怀旧之情涌上了他的心头，过去和兄长宗敬共同艰苦创业的种种情景，又一一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茂一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甚至可以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的青春和他的许多精力就凝聚在这里，变成了高大的工厂，变成了如雪的面粉……

1947年，荣德生又倡议在无锡办一所正规教育大学——江南大学。荣一心遵照父亲的意志，积极进行筹办。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七日，江南大学正式在荣德生的故乡——无锡西乡荣巷的临时校舍举行了开学典礼。荣德生亲自出席，荣一心在致词中阐明办学宗旨是：“探讨今后工商建设之实际需要与可循之途径，苦功苦学，获得专门学识而蔚为人才，以开发宝藏，救贫裕民。”第二学期即迁至后湾山新校舍，那里建有教学大楼、图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球场、湖上餐厅、实习工场……

在荣德生的居室里，挂着他撰写的一条横幅：

立上等愿 结中等缘 享下等福

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平日粗茶淡饭，粗布长衫，对物质生活从无过奢的要求，更与有些资本家沉湎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迥然绝异。他一生致力于发展实业，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早在1912年他就在《无

锡之将来》中规划了建设故乡无锡的蓝图，借助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太湖之滨建设一个“国际博览中心”。为此，他几十年间在无锡兴办了许多工厂，进行了多项市政建设，开发了多处风景旅游资源。除了和兄长荣宗敬共同创办了茂、福、申新企业集团外，荣德生还建立了5个中等技术培训机构、11所大中小学、一个藏书近20万卷的乡村图书馆，建造了88座桥梁，修筑了开原路（今梁溪路）、通惠路等交通要道，开辟了梅园、锦园等风景名胜。这些，也都是他的“天元之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尽艰辛 为国为民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南京。5月2日揭开了上海解放之战的帷幕。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以“在瓷器店里捉老鼠”的办法，开始与国民党汤恩伯军团，展开了一场战略决战。荣毅仁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要审判他的那一天，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33岁的荣毅仁，感到自己也解放了。他一身轻松，深信自己坚留大陆的选择无比正确。

1949年6月2日，阳光灿烂，万里晴空。一辆接着一辆的小轿车，向矗立在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开来。上海产业界人士分批乘上电梯，各人怀着不同的心态，走进四楼宽敞的会议室。这是共产党人邀请上海产业界人士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为了使处于半瘫痪中的上海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市长陈毅准备和上海产业界代表人士见面会谈。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上，都是上海知名的工商企业代表，如盛丕华、荣毅仁、刘靖基等人。陈毅指示：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次与上海产业界人士见面，宁可多一个，也不漏掉一个该邀请的人。经过周密、精心的准备，于是有了这次不寻常的会谈。

会议由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主持，他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带有书生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与会的工商人士，包括荣毅仁在内皆对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当潘汉年介绍陈毅讲话时，产业界人士更是又惊又

喜，站起来的是位穿着几乎发白的黄布军服模样的汉子，光着脑袋，一口四川话，和所有在座的人一样，并非三头六臂，也不像国民党造谣的那样青面獠牙，指挥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消灭和俘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员，其实和普通士兵没有两样，而且谈吐文雅、亲切、幽默又风趣。

在这次座谈会上，荣毅仁经随军南下的盛康年介绍，与潘汉年、陈毅相识，印象良好，几天以后，潘汉年请盛康年捎话，表示陈毅想与荣毅仁见见面，荣毅仁也想加深对共产党的了解，当即表示同意，见面的地点选择在盛康年岳母家。一天，在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陈毅和荣毅仁见面了，同时被邀请的还有盛丕华、刘靖基二位大实业家。大家从企业生产、市场行情和经济状况，一直谈到个人家庭、经历和爱好。

为了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不久，荣毅仁也请陈毅和潘汉年到家里吃饭。那是1950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潘汉年和夫人董慧陪同市长陈毅和夫人张茜，一起聊。陈毅和潘汉年那风趣而亲切的谈话，再一次给荣毅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从内心感到共产党也是很有人情味的，逐渐消除了最后一点戒备心理。

此后，因工作关系，荣毅仁与潘汉年的交往日深，彼此经常串门子，聊天谈心，建立了密切的朋友关系，成为知己。荣毅仁通过潘汉年，还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陈毅同上海产业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后，大家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许多工厂陆续开工。但亟待解决的“二白一黑”（指大米、棉花、煤炭）仍困扰着这个第一大城市。当时的荣氏企业，大多数人离开上海，申新纱厂和福新、茂新面粉厂皆由荣毅仁一个人总负责，压力很大。原料紧缺，开工困难，市场萎缩，产品在上海销路有限；同时资金拮据、劳资纠纷时有发生。遇到这类问题，潘汉年总是积极地联系各方面的负责人，为荣毅仁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经由潘汉年的介绍，荣毅仁又结识了上海纺织局、人民银行、华东贸易部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许多问题得到了很快的解决。

1950年初，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泽东曾宴请参加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荣毅仁也在被邀请之列。那天，毛泽东站在大厅门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招待前来的客人，这是荣毅仁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当同行的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他那宽大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荣毅仁的手，毛泽东说：“荣先生，你来了，你好啊！老先生好吗（指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短短几句话，使荣毅仁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宴席摆了四五桌，荣毅仁在第二桌，与周恩来同桌。周恩来因事晚到，一进门，就满面春风地和大家打招呼、握手，见到当时年仅34岁的荣毅仁，周恩来诙谐地说：“喔，少壮派！”举座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从此，周恩来给荣毅仁起的“少壮派”雅号，就广泛流传开了。

在宴会上，当毛泽东特别讲道：“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这句话给荣毅仁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宴会上，荣毅仁还见到了刘少奇和朱德，他们都热情地问候了荣毅仁。几位共和国元勋的关心，使荣毅仁再一次领略到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

1952年，为了克服一部分干部入城后所滋长起来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习气，反对私营经济、抗拒摆脱国营经济的倾向，中共开始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紧接着在工商界展开了反“五反”：即行贿、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厂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性处理时，遇到一个问题，如果都被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荣毅仁的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把荣家划到哪一类”的问题上，陈毅和前往上海检查工作的薄一波反复商量，原定为基本守法户，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报毛泽东，毛泽东认为不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

1955年10月，荣毅仁进京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两次邀请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叔通、李烛尘、沈钧儒、胡子昂、荣毅仁及各民主阵营派代表共500多人召开

座谈会。

会议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认清前途，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前途结合在一起。荣毅仁在会上热情地邀请毛泽东“到上海时，请去申九视察”。

1956年1月，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他在参观完江南造船组研制的第一艘潜艇后，便驱车前往申新九厂（今上海国棉二十二厂）视察。毛泽东前来上海五十多次，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厂，这就是申九。他做如此选择，自有他的想法。1月9日，毛泽东抵达上海后，即提出要和一些工厂去看看，市里选了几个国营工厂。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却决定视察申新九厂。申九是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一，创办时即规模很大，职工达6000人，1949年后，申九仍是上海棉纺行业的骨干企业之一。毛泽东说，现在是公私合营高潮的时候，要到合营厂去。荣毅仁是大资本家，在全国很有影响。

陪同毛泽东视察的中央负责人有陈毅、汪东兴、罗瑞卿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等。荣毅仁在申九厂热情地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一下车，一面同荣毅仁握手，一面对他说：

“你不是要我来么，今天我来了！”

荣毅仁激动地说：“欢迎，欢迎！”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老板换了。”参观时，荣毅仁走在毛泽东身边，不时向毛泽东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每到一处，都看得很仔细，不时问这问那。在粗纱间，毛泽东停在一辆机车旁看女工操作。这位女工做梦也没想到来的贵宾是毛主席，陪同的市工商联主席钟民向她扬扬手说：“你和毛主席谈谈吧！”她才如梦初醒，赶忙介绍自己的工作及生产流程情况，毛泽东听了，愉快地点点头，与她握手。毛泽东仔细地视察了七个车间，所到之处充满掌声和欢笑声。视察结束后，毛泽东对陪同的同志谈到此行的目的，毛泽东说，苏联取得政权后，一个命令就把资本家的财产剥夺了。列宁的路线、方针，我们一定要执行，但中国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不能硬拿过来，问题是拿过来后怎么巩固，要

做工作，要对职员、代理人做政治思想改造，要使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是光荣的。毛泽东还说，荣毅仁愿意把工厂交出来，这是进步的，看了工厂，可见工人是掌握政策的。

1950年，国家经济困难发行公债，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哪里晓得到交钱的时候，却交不出来那么多，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他讲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经了解，荣毅仁说的是实情，陈毅便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之后，陈云来到上海，充分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后，回去就消灭了上海的认购公债数额。这件事就足以说明荣毅仁在当时工商界的积极影响力。

1949年前后，荣氏企业，面临着重重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1953年5月在政府帮助下荣毅仁将上海申新各厂重新组合，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并主动向政府提出建议，对他的申新系统棉纺行业实行统购统销，荣家企业开始迈上新的发展道路。

1954年4月在中共中央批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有步骤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营的意见”。不久，荣毅仁在上海率先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将他的申新系统的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此后，武汉、无锡等地的荣家各厂也都施行。

1953年12月，申新所属的广州二厂厂长荣均泰征得荣毅仁同意后，首先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翌年6月1日被正式批准公私合营，同时退出申新总管理处。

1954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第八十次会议，决定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无锡申新二厂的合营手续，申三厂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4年4月2日，上海申新系统举行劳资座谈会，荣毅仁提出申新要争取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发展。他又说，要召集股东开会讨论，自愿的程度不断提高，争取申新早日合营。4月14日，申新86户股东开

会，会议中决定由总经理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5月31日荣毅仁代表申新分别致函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华东纺织管理局，提出合营申请。6月15日华东纺织管理局派鲍复带领工作组进驻申新，8月11日，市营工厂公私合营。8月13日，申新总管理处召开了拥护政府批准公私合营、欢迎公方代表进厂大会。

经过改造后的申新集团的人事是这样的：

总经理：荣毅仁

副总经理 鲍复 吴中一 汪君良 吴士槐

厂长 副厂长

申一：许泉福 荣宝桩 詹荣培 胡学训

申二：王崇基 蒋兰言 陆应祺 寿秉义

申五：孙杰 施之仁 郑昌延 韦特孚

申六：秦德方 何秀凤 庞书祥 过锋先

申九：吴中一 杨锐 归素贞 张贡

潘襄德 荣韧初 张国梁 何增福

中华：蔡惠

鸿丰：戴逢吉 肖保忠 钱皆安

陕西宝鸡的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全国的荣氏企业中是最早的。1951年3日，李国伟在上海召集汉、渝、陕等经理会议。陕西厂经理瞿冠英、龚一鸥请求将宝鸡申新厂合营一事列为议程。李国伟说：“让宝鸡厂合营，以摆脱我们整体的包袱，将无法克服的困难由政府力量解决。”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同意宝鸡申新各厂与政府合营。并将此决定报告上海申新总公司荣毅仁和住在无锡的董事长荣德生。荣德生致函李国伟：“一切同意 务须努力前进 以期公私两利 增加生产。”

得到总公司同意后，宝鸡厂经理瞿冠英等人便积极运作，多次到陕西省工业厅表示合并的决心和请求。经过反复协商，10月31日中央财委回电陕西省委并西北财委：“基于自愿合营，我们又有准备，本委考虑同

意。合营后的扩建计划应与中央计划密切结合，以免盲目生产。”10月5日，在西安举行公私合营协议签字仪式。

宝鸡厂公私合营的成功，对武汉厂的公私合营有很大的影响。李国伟说：宝鸡纺织、面粉、造纸、机械厂及天水面粉厂获得陕西省工业厂的合作，而改组为公私合营新秦企业公司。合营实现后，在短短的时间中，空前提高了生产量，扩大了生产设备。这一个新的事实坚定了我们对于公私合营的信心、而经过1952年“五反”运动的教育，以及一连串的爱国运动，结合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前途，对于汉口厂我们更感觉到有争取进一步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而走上公私合营的必要。1953年9月，李国伟提出了“申请公私合营计划书”，10月15日，武汉市财经委员会批准了申四、福五汉口厂的合营申请。1954年2月1日，申四汉口厂更名为“公私合营汉口申新纱厂”；3月1日，福五汉口厂更名为“公私合营汉口申新面粉厂”。4月9日，公私双方代表在武汉市政协会议室举行公私合营签字仪式，新华社为两厂实现公私合营在《长江日报》上发了专讯。两厂广大职工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实行公私合营。

合营后的荣氏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对资本家的股金实行支付定息，原来荣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并对企业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改造和改革，使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企业面貌焕然一新。如合营后的上海福新面粉厂，于1956年底与自丰等面粉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淘汰了许多陈旧设备，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管理费用也大幅度降低，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

荣氏企业是1949年后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荣毅仁率先接受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革，无疑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视察了申新九厂并高度赞扬了合营后的申新九厂，荣毅仁受到极大鼓舞。他和主持上海工商联的几位实业家，现身说法，宣传政策，成为推动改革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工商联在中苏友好大厦（现淮海展览中

心)举行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有4000人参加了这次盛会，盛中华主委和荣毅仁副主委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曹荻秋副市长呈递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

1956年底，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场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运动中，荣毅仁等工商业者起了带头宣传作用，自然是上海顺利完成改造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被时人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美誉。

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上，荣毅仁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光荣当选上海市副市长。从民族资本家到人民政府副市长，新旧社会两重天。从此，他满怀信心地投身于上海的建设之中，在短短的两年任期内，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为荣毅仁拉选票，在当时传为佳话。《劳动报》记者徐行采的一篇报道，曾有生动的描述。

陈毅本已上调中央做周恩来的助手了，会议开始时忽然从后台走了出来。他身穿一件米黄色皮茄克，十分随便，先走近台边问候大家：久违了，想念得很呀！匆匆赶回来，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让他选上副市长！

陈毅接着解释：毛主席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先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

陈毅接着介绍了荣毅仁的简历、学识和品德，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要好朋友之一，我要以老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所起不到的作用。”

陈毅于是举出一例：一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我国，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会谈：事后这位客人对陈毅说，谈得很开心。陈毅感到很新鲜，

便问荣毅仁究竟讲了哪些，荣毅仁说不过讲了些家常话，说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裕，又不担心敲诈绑票，工作的、读书的都感到有前途。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意思了，倒宁愿把定息捐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片纱厂。陈老总讲到这里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该不该？”一席话使会场顿时出现欢声笑语。

陈毅元帅看中荣毅仁，欣赏荣毅仁，表现了他的慧眼卓识。同时，作为世家子弟出身的荣毅仁，不仅具备精明的企业经营之道，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领导才能。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资本家，对于新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倾注出别人少有的热情。1950年12月16日，上海工商界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荣毅仁肩扛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为了支援抗美援朝运动，荣毅仁代表申新职工提出捐献十架战斗机的计划。经过全厂上下的共同努力和协同作战，最后共捐献飞机十二架，超额完成任务。

这样，荣毅仁走马上任。当时主持市府工作的是常务副市长曹荻秋同志。这位“个子不高、满头银发、步履从容、说话斯文”书生模样的共产党员，却是一位有见识、有魄力的领导人。在主持政府工作期间，他始终真诚地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由于荣毅仁一直在荣家企业中从事工业管理，尤其长于轻纺工业，业务熟悉，同国内外有联系，信息灵通。所以，在副市长的具体分工上，经曹荻秋同志提议，荣毅仁主管轻纺工业。针对当时存在的发挥党外副市长作用不够的问题，曹荻秋多次找荣毅仁先生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大胆去抓工作，在轻纺工业上开创一个新局面。并吩咐市政府办公厅为荣副市长安排好办公室，同时还给配备了一个精干的秘书班子，让荣毅仁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并不是市府的点缀或花瓶。后来，为了荣毅仁工作方便，能及时迅速地解决问题，市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曹荻秋、荣毅仁副市长联合秘书组，曹还要求秘书们遇事多向荣副市长请示汇报，对荣毅仁分管的工作，总是鼎力相助，从不横加干涉，令荣毅仁备受感动。

针对上海工业基础好，特别是轻纺工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具有产品多的优势，经过慎重考虑和市场调查，荣毅仁及时提出了上海要积极发展以

化纤工业为龙头的系列名牌产品。这一新的主张，得到了市委和市府的高度重视，成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今的上海，在我国的棉纺、化纤工业中独领风骚，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中凝聚着荣副市长的不少心血。

1958年，当时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幻想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宏伟目标，提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大地迅速刮起“大跃进”的旋风。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切实际地提出：“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

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自然也不例外。为了添加原料，有人甚至把居民住宅的铁门卸下，把客厅壁炉的铁框拆下拿去炼铁。当时的荣毅仁，担任上海万人调查团的分团长，正在郊区嘉定县的一个公社下乡。一天，因事回到市区，听说了砸铁门、拆壁炉的事，感到十分困惑和不解。因为他深知，如此全民炼铁，并不能炼出真正的钢铁，反而把本来有用的，都变成了一堆堆废料。于是，他向曹荻秋反映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久，这些偏激的行动得到制止。当时的中国，一人头脑发热，万众随之狂热，在那种举国皆“左”的时代氛围中，荣毅仁斗胆陈言，是冒了一定风险，表现了一代实业家的正直和良知。

1959年，由于工作需要，荣毅仁被调往北京，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离开上海前，曹荻秋仍诚恳地对荣毅仁说：“你虽到北京去工作，仍是上海的副市长，还要关心上海的工作。”1963年春，荣毅仁返沪休假，市政府召开春节座谈会，荣毅仁仍被邀请出席了会议。

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周恩来给予很大的关怀。一次，周恩来见到荣毅仁说：“你来啦，很好。”周总理是那么体贴人，深怕他不习惯北京的生活，特地对他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回答说：

“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顿时“全国山河一片红”，“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又陷入了一次历史浩劫之中。这时在全国工商联任职的荣毅仁，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一样，在劫难逃，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常常被游街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打击，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工作。一时之间“牛鬼蛇神”遍天下。

在荣毅仁身处逆境时，周恩来等对他给予了无限的关怀。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一大批红卫兵到荣家“造反”，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备受折磨。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让纺织部派出的红卫兵赶到荣家，以对付外来的红卫兵，让外来的红卫兵退出荣家，从而把荣氏夫妇巧妙地保护起来。当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颖超见到荣毅仁，特地对他说：“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前途的。”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一次周恩来召开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主委、副主委等参加的会议。当时荣毅仁是政协常委，又一直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本来有资格参加，可有人就是不通知，总理则点名坚持一定要荣毅仁参加。在讲话中，总理还表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使当时身处逆境的荣毅仁感动万分。

1972年陈毅病逝，荣毅仁悲痛万分，很想去看这位自己一向颇为爱戴的老市长最后一眼。出于当时的处境，荣毅仁感到不好随便去，就跑到他的邻居王震家去问：“我可不可以参加遗体告别，因为我没接到通知。”王震说：“我给你去问问看。”很快，王震告诉荣毅仁：“你去参加吧，遗体告别并没有发通知。”

1973年，周恩来又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让荣毅仁参加廖承志率领的访日代表团，出访刚刚建交的日本。这样，荣毅仁的处境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中，荣毅仁扫过地，担过煤，挨过批斗，从此落下了腰痛病。他苦闷过，彷徨过，但正是由于有像周恩来那样一批高层人物的保护和关怀，荣毅仁始终没有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产生动摇。在生活最困苦的时候，他仍对儿子说：“这只是生活中的一点曲折，要坚强，要看实质，挺